

一波三折、跨越六十年的编纂

■舒晋瑜

从上世纪50年代至2020年底，持续六十多年编纂，《古本戏曲丛刊》终于出版了。一千一百九十三种传奇、杂剧、宫廷大戏，从元代至清末，中国六百多年间最优秀珍贵的戏曲作品几乎都收入囊中，构成了一个宏富、完整的戏曲文献体系。

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中国戏曲作品总集，收集了留存于世的绝大部分戏曲剧本与珍本，是新中国规模最大的古籍整理成果之一，也是当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积累的重要标志。六十年间，丛刊出版过程一波三折，文学所几代学人为《丛刊》的编集出版付出了切实的努力。

1952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后来的中国社科院文研所)所长的郑振铎有一个庞大的计划，他希望系统地汇集影印古代剧本，把中国戏曲全部网罗进去，把数千种古剧本编成丛书，以供后人研究。

“只有从事搜集资料的人，只有研究戏曲史的人，方才知道搜集资料是如何的困难。那工作是艰苦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是要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的。古籍收藏家的辛勤，诚如如鱼饮水，冷暖自知。”1954年2月11日，郑振铎在《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序》的序言中，表达了想要“使之化身千百，俾古剧能为大家人所利用”的愿望，同时表达了对中国戏曲的深厚感情：“中国戏曲在人民群众之间有广大深厚的基础，它们产生于人民群众里，植根于人民群众的肥沃的土壤上，为历代的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我们可以说，没有一种文学形式比戏曲更接近人民，使其感到亲切、感到欣慰，而且得到满足与享用的了。”

郑振铎的设想是：初集收《西厢记》及元明两代戏曲、传奇一百种；二集收明代传奇一百种；三集收明、清之际传奇一百种。四、五集以下，则收清人传奇，或将更继之以六、七、八集，收元、明、清三代杂剧，并及曲选、曲谱、曲目、曲话等有关著作。若有余力，当更搜集若干重要的地方古剧，编成一、二集印出。期之三、四年，当可有1000种以上的古代戏曲，供给我们作为研究之资，或更作为推陈出新的一助。他还说：“这将是古往今来的一部最大的我国传统戏曲作

品的结果。”

1954年至1958年，郑振铎以个人力量主持出版了“丛刊”的前四集，共约四百册。前三集收录元明清南戏传奇，每集各计剧目一百种。《初集》1954年出版，收录元杂剧《西厢记》和元、明时期戏曲传奇一百种。其中第一种书《新刊奇妙全相注西厢记》为海内外孤本。《二集》1955年出版，收录明代传奇一百种。其中文林阁刻本《张子房赤松记》《高文举珍珠记》《刘秀云台记》1958年出版，专门收录元明二代的杂剧，收录杂剧总集八种，共有三百七十多个剧本，以元人杂剧为最多，凡传世的元杂剧，几乎搜罗殆尽。其中明万历时期刻本《古杂剧》聚集各家所藏，配成全帙，弥足珍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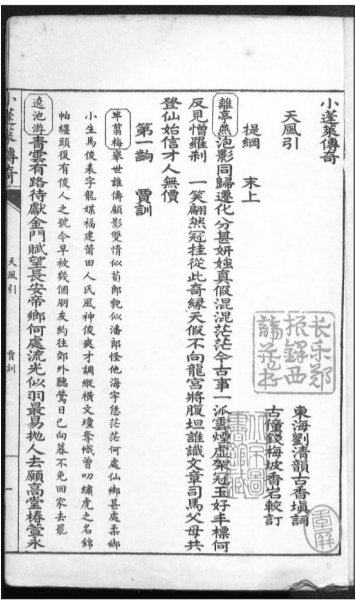
1958年10月16日下午4时，郑振铎出国访问前一天写完序文，第二天不幸因飞机失事遇难，第四集序文成为他写作生涯中最后一篇。

此后《古本戏曲丛刊》的出版艰难，但仍由学者前赴后继继续这项艰巨的事业。

二

为了配合历史剧的改编工作，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齐燕铭倡议先编第九集清官廷的戏本(升平属)。于是，1964年，由吴晓铃先生主持，赵万里、傅惜华、阿英、周贻白、周妙中诸学者组成新的编委会，续编了《古本戏曲丛刊》第九集。该集均为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等处收藏的清内府钞本及朱墨五色套印本。正在继续编纂第五集的时候，遇上了十年浩劫，这项工作停顿了十九年。

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中有这样一句话：“从事古籍整理的人，不但要有知识基础好，而且要有兴趣。”李一氓就是知识基础好而特有兴趣的人。1983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第二任组长李一氓又抓了《古本戏曲丛刊》的续编工作，召集研究人员和出版社、图书馆的负责人，商谈了多次。1986年，吴晓铃先生主编，与郑绍基、刘世德、吕薇芬、么书仪等学者合作，编纂第五集，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集收录明后期及清顺治、康熙时期的戏曲作品85种，另附2种，包括教种日本、法国等海外收藏而国内已未见过的戏



《小蓬菜闹传奇十种》，收入《古代戏曲丛刊十集》

曲版本。

在《谈〈古本戏曲丛刊〉的出版》中，李一氓撰文回忆郑振铎：“特别值得钦佩的是他以个人力量编印了《古本戏曲丛刊》四集，共约四百册。但是由于他因公殉职和十年浩劫，第五集以后就没有人继续编下去了。……我做为接替郑先生管理古籍整理规划的职责和郑先生很亲密的一个朋友，现在可以放心了，可以算对得起他了。”(1986年8月3日《解放日报》)不幸的是，李一氓没有看到六、七、八集的编印，就与世长辞了。

三

就像是曾经参加前四集的——北京的陈思惠先生、郑云邈女士、周妙中女士、伊见思先生和上海的丁英桂先生一样，吴晓铃先生说他们是“默默地辛勤着，不求闻达，未为人知，然而永远也不会被我们忘记”(《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序》)。后来的学者也是“不求闻达”，甚至序言的署名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的首次编辑是吴晓铃在周妙中大量抄书的基础上完成的，在李一氓的支持下，吴晓铃先生将选定的一百余种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传奇剧本和抄本汇集之后，连同编目一起交给了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审阅之后把全书送回，要求重新查书、比较版本、选择书品、配补缺页和漫漶不清的印页，同时要

为这些刊本、抄本的作者、出版者、出版年代进行考订……在目录上要有标注。

北大中文系55级(60属)的毕业生吕薇芬和68届毕业生么书仪参与了《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的编辑工作。

吕薇芬回忆说：“开始的时候在所里给我们分配了一间专门的屋子。小屋里放了各种参考书。我们是很辛苦的。因为此事有时间限制，吴先生又弄了一百多种书，时间紧任务重。我们两个性格还比较像，又着急又不敢偷懒。查好书之后接着编目录，天天都去所里，去了一个多月。我和么书仪查书时一起去各地图书馆，上海、杭州、山东……”吕薇芬说，她们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断代问题。有的书是没有作者的，怎么断代？只好先看参考书，但最主要、最有根据的办法，就是找那个字。剧本里面提到的，就从剧本里面找内证。很多时候要把整本书看完后，才知道内容，才知道用词等等，然后才能断代。交给她们的这一百多种书，每一种吕薇芬、么书仪都过目排查了，最后出版时收录的是八十多种。

么书仪至今保存着当年的一沓册。笔记中记录着她和吕薇芬去过中山大学图书馆善本室，查阅过他们的《笠翁传奇十种》《墨憨斋新曲十种》《念八翻传奇》《芝龛记》《旗亭记》。去过中山图书馆，查阅过他们的《笠翁传奇十种》《玉燕堂四种曲》《西堂乐府》《芝龛记》《六如亭》……南京图书馆的管理人员曾非常惊讶地问：“你们从哪里知道我们有这本书？”

么书仪还记得她们去上海图书馆善本室，查阅过上图所藏的孔传铨“三款”中的《软羊脂》和《软脚筒》，吴晓铃先生著录的上图藏本是“抄本”，可是，吕薇芬和么书仪在上图却看到了这两种传奇的“稿本”，当时的高兴之情难以言表。

但是，也有因为要复印“海内孤本”需要加倍付费而中差的时候。吕薇芬打听了所有的公私款项，还差一点，最后，她把二人租用碗筷押金抵回，才凑齐了复印图书民国抄本《软脚筒》的费用，二人把重金复印到手的海内孤本小心翼翼地锁进箱子，就坐在大明湖边一个烤红薯摊子的小板凳上，一边吃烤红薯充当午饭，一边商量怎么回北京……

四

《古本戏曲丛刊》虽然是一套

影印的丛书，但并非只是将各时代珍稀戏曲文献加以汇集、影印出版这么简单。戏曲作者是谁，写于什么时代，如何分类？如何排序？哪些作品应该放入《丛刊》六集，哪些应该放入七集、八集？这些都涉及严谨的学术问题，蕴含着文本考证、版本鉴别等多方面的学术研究。郑志良为各集所收文献认真排序，并对选目提出过很多基于扎实考辨的具体建议，比如他曾专门考证过艺术研究院收藏的《新编遇合奇缘记》的作者满族女作家桂仙，是八旗贵族出身，与存温斋是恋人，存温斋应是清宗室存华。因此他建议将存温斋所作《龙江守岁》附于《新编遇合奇缘记》之后，得到专家的一致认可。

么书仪和吕薇芬对此更是有深切的体会。“版本问题最麻烦，如果是刊本，是哪一朝何处的刊本？家刻还是坊刻？如果是抄本的话，是谁的抄本？是稿本？家抄本？旧抄本？传抄本？……都要尽力弄清楚。为此，文本本身的印章、批点、序文、未识、题诗、题字、所署家名别号、书品、讳字等等，都有可能是依据和线索，而最棘手的是草书序文和印章，有时候，去请教文字学所以博学的曹道衡、沈玉成、陈毓璞……他们也会一筹莫展。”

么书仪回忆，在选择版本的时候，碰到过的最有意思的情况是：一个传奇作品的两个半叶都是断版的拼接，开始读起来上下两块断版的文意总是连接不上，她们俩读来读去很多遍，想来想去不得其解，最后吕薇芬突然发现——两叶的断版上下段相互错接在一起了……这是一件即使是在古籍整理的专著上都找不到的奇怪错误啊！找到了这个“答案”的当时，她们俩高兴之极，所做的处理只能是注明把它断开重接——“断开重接”四个字看起来并不起眼，可是这四个字背后的苦甘自有亲历者才知道。

这种真正的考据和研究过程，也使参与的学者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五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古本戏曲丛刊》的编纂工作陷入停顿。不仅原定计划中的清代戏曲还有大量的存本未及编辑和影印，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海内外陆续发现的元明戏曲剧本，也有待编目和收录。不少知名学者呼呈完成《古本戏曲丛刊》的编纂出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华

书局编审程毅中在2012年向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古籍规划领导小组递交了《关于完成〈古本戏曲丛刊〉的建议》，希望把《古本戏曲丛刊》后续部分列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使全书得以完整。建议得到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古本戏曲丛刊》六、七、八集很快被列入了《2010—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决定重新启动《古本戏曲丛刊》六、七、八集的编纂工作。学研究所高度重视“丛刊”项目的后续工作，积极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沟通联络，迅速组建由文学研究所牵头、有关老中青学者共同参与的“丛刊”六、七、八集编纂工作协调小组。刘跃进负责学术组织工作，刘世德、吕薇芬、么书仪等先生负责学术指导工作，李政、李芳负责学术联系工作。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由方自金社长亲自挂帅，组成以殷梦霞副社长为核心，以廖生训、于浩、程鲁涛、南江涛、苗文叶、李精一等编辑为骨干的专业编辑团队。

《古本戏曲丛刊》六、七、八集编纂启动座谈会“召开，标志着这一重要项目全面启动。2016年，《古本戏曲丛刊六集》出版，收清代顺治至乾隆前期的传奇和戏曲别集七十七种，共计一百零九种剧目；2018年，《古本戏曲丛刊七集》出版，收清代康熙到乾隆时期传奇作品和作家戏曲集五十五种，其中包括戏曲集八种，合计收入传奇、杂剧共九十二种；2019年，《古本戏曲丛刊八集》出版，收清代乾隆、嘉庆时期传奇、杂剧八十一种，合计传奇、杂剧八十一种；2020年底，《古本戏曲丛刊十集》出版，收入清代乾隆至光绪时期传奇、杂剧七十三种附一种，合计收入传奇、杂剧一百三十八种。(《古本戏曲丛刊》全十集共收入元、明、清传奇、杂剧等一千一百九十三种，合计成书一百四十一函一千三百九十八册。

《古本戏曲丛刊》实现的是学术的积累，是文化的传承。作为新中国最重要的古籍文献整理出版工程之一，丛刊出版是我国出版事业整体业绩的生动写照，对于推动戏曲研究和戏曲学科建设功莫大焉。甚至有专家认为，没有《古本戏曲丛刊》，就不会有《中国戏曲发展史》。这套蕴含着几代学人和出版人希望与梦想的文化遗产基础建设工程，最终配成完璧，完成了郑振铎、吴晓铃等先生的遗愿。

■刘碧林

《庄子》(又名《南华经》)被译介到英语世界已有100多年历史。百余年间，国外传教士、海外汉学家、华裔学者与中国学者等译者群体为英语世界贡献了二十多个《庄子》英译本，其中包括十个全译本及十多个选译本，这些译本对英语世界的文化与思想产生了影响。

英清政府建交初期的“了解式”译介

19世纪，英国与清政府的“交往”日益频繁，对中国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彼时，英国传教士、外交官与在华工作者凭借其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与深入考察，自然充当起了中国了解中国文化、思想、语言情况的先行者，这些人中就包括《庄子》的第一位英译者，对道家学说颇有研究的英国报业家、记者巴尔福(Frederic Henry Balfour)。1881年，巴尔福翻译的《庄子》全译本《南华真经——道家哲学家庄子的著作》(Divine Classics of Nan-hua, being the Works of Chuang Tszu, Taoist Philosopher)由别发印书局(Kelly & Walsh)在上海与伦敦同时出版，从此正式开启了《庄子》前往英语世界的文化交流之旅。次年，由英国政府派遣至清政府担任外交官的汉学家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对巴尔福的译本进行了重新整理，并发表于香港英文汉学期刊《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1889年，翟理思翻译的《庄子》全译本《庄子——神秘主义者、道德家和社会改革家》(Chuang Tzu: Mystic, Moralist, and Social Reformer)由伦敦敦理奇出版公司出版，这本书于1926年修订并更名为《庄子——道家哲学和中国的神秘主义者》(Chuang Tzu: Taoist Philosopher and Chinese Mystic)后再版。翟理思之子翟林森(Lionel Giles)同样对中国文化抱

有极大兴趣，他对《庄子》进行了选译，编撰成《中国神秘主义者沉思录：庄子哲学选读》(Musings of a Chinese Mystic: Selections from the Philosophy of Chuang Tzu)一书，由伦敦约翰·默里出版社(John Murray Press)于1906年发行。1839年，英国派遣著名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到中国传教，将翻译中国古籍作为了解中国文化的途径，而《庄子》的翻译正是他翻译工程的一部分。1891年，牛津大学汉学教授马克思·穆勒(Max Müller)将理雅各的译本《庄子全文》(The Writings of Kuang Tszu)作为“道家经典”(Texts of Taoism)收录进其主编的《东方圣书》(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之中，后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早期的四位《庄子》译者凭借自身对中国文化、思想、语言的理解，顺利完成了这部中国古籍的翻译“试验”，为《庄子》的后续翻译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战”后兴起的“研究式”译介

一战后，英美两国汉学研究开始进入繁荣发展阶段。随着英美两国汉学研究的不断开展与深入，《庄子》的英译工作也在稳步推进之中。

1931年，哲学家冯友兰翻译了《庄子》的内七篇，在此基础上结合郭象的注疏以及自身的见解解撰完成《庄子：内容选译与郭象之哲学阐述》(Chuang Tzu: A Selected Translation with an Exposi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Kuo Hsiang)，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64年，该译本在纽约再次出版。1939年，英国东方学家、汉学家亚瑟·韦利(Arthur Waley)通过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古代中国的三种思想》(Three Ways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选择性地介绍了《庄子》中部分哲理故事和论辩情节，虽非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却易于读者的理解和接受。1942年，英国汉学家修中诚(Ernest Richard Hughes)选译了

《庄子》的内七篇，将译文命名为《自由诗人庄子》(Chuang Chou, the Poet of Freedom)，并收录进《古典时代的“中国哲学”》(Chinese Philosophy in Classical Times)之中，该书由伦敦登特·默里出版社(J.M. Dent & Sons)与纽约杜塞出版社(E.P. Dutton & Co.)同时发行。

同年，纽约兰登书屋(Random House)出版了中国学者、翻译家林语堂编撰的《中国与印度的智慧》(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一书，书中收录的《庄子，神秘主义者和幽默家》(Chuangtse, Mystic and Humorist)一文介绍了庄子的思想与其神秘主义，并包含了《庄子》中十一篇内容的翻译。除上述译本外，1947年哈佛大学燕京学院洪业主编出版的英文工具书《庄子索引》(A Concordance to Chuang Tzu)也是英语世界了解《庄子》的重要书目，该书于1956年在剑桥重新出版。此外，理雅各于1959年再版的全译本中附上了日本禅学家铃木大拙(Suzuki Teitaro Daisetz)的导言，对庄子及其哲学思想与语言艺术作了更加全面的介绍。

上述译本之中，除了林语堂的选译与《庄子索引》，其余皆被收录进由华裔美国图书馆学家袁同礼编写、耶鲁大学1958年出版的《西方文献中的中国：续考中国书目》(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 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s Bibliotheca Sinica)这部涵盖1921至1957年间有关中国著述的西方汉学目录学著作之中，该书为《庄子》在英语世界更加广泛的传播、接受及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支持。

美国“反文化运动”后的“迎合式”译介

上世纪60年代，美国出现了反叛主流信仰的“反文化运动”，当时的青年们迫切希望寻求有别于美国本土文化的精神寄托，于是他们把目光转向了东方文化。此时，美国一些大学开设的亚洲文化课程

助推了《庄子》在美国的译介与传播。这一时期的《庄子》的英译译本主要由美国学者与华裔学者完成。

1960年，美籍华人学者、哲学史家陈荣捷(Wing-tsit Chan)选译的《庄子》部分章节被收录进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狄狄·拜瑞(Wm. Theodore de Bary)与艾琳·布鲁姆(Irene Bloom)联合编撰的《中国传统的来源》(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一书之中。三年后，陈荣捷又选译了《庄子》其他内容，并收入其编撰的《中国哲学名著选读》(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一书中。同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庄子》中十一篇内容的翻译。除上述译本外，1947年哈佛大学燕京学院洪业主编出版的英文工具书《庄子索引》(A Concordance to Chuang Tzu)也是英语世界了解《庄子》的重要书目，该书于1956年在剑桥重新出版。此外，理雅各于1959年再版的全译本中附上了日本禅学家铃木大拙(Suzuki Teitaro Daisetz)的导言，对庄子及其哲学思想与语言艺术作了更加全面的介绍。

1974年，美国研究道家的华裔学者冯家福(Gia-Fa Feng)与美国翻译家简·英格里希(Jane English)合译的《庄子内篇》(Chuang Tzu: Inner Chapters)由纽约古典书局(Vintage Books)出版，该译本以简明的英语和精美的设计吸引了广大英语读者。

庄子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思想在《庄子》译本中得到了良好呈现，为参与“反文化运动”的美国青年在探索新的内心寄托时提供了一剂良药。此外，这一时期的译本也为这些青年文学创作者提供了新鲜的灵感与素材。

中国全面开放后的“自由式”译介

上世纪80年代至今，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各国学者获得了对中国开展更加广泛研究的机会。《庄子》在这一时期开始被大量译入英语世界，这一阶段的译者身份多样。

1981年，英国汉学家葛瑞汉(Angus C. Graham)通过艾伦·昂温出版公司(Allen & Unwin)出版了目前为止译解篇目最多的《庄子》选译本《庄子内篇及其他篇章》(Chuang-tzu: The Seven Inner Chapters and Other Writings from the Book Chuang-tzu)。上世纪90年代后，《庄子》的英译工作全面展开，译本数量增长迅猛。1991年，美国作家托马斯·克利礼(Thomas Cleary)的《道的要义》(The Taoist Classics)由哈珀珀金山出版社(Harper San Francisco)出版，该书包含了《道德经》的全文翻译以及《庄子》的内篇翻译。1992年，由美国密歇根大学哲学教授布莱恩·布雅(Brian Bruya)翻译、中国台湾著名漫画家蔡志忠配图的《庄子》漫画译本《庄子说：自然之乐》(Zhuangzi Speaks: The Music of Nature)经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2019年，该译本更名为《自然之道》(The Way of Nature)后再版。1994年，班坦图书公司(Bantam Books)在多伦多与纽约同时出版了

美国汉学家梅维恒(Victor H. Mair)的《庄子》英语全译本《逍遥游——庄子的早期道家故事和寓言》(Wandering on the Way: Early Taoist Tales and parables of Chuang Tzu)，该译本附录中的木语汇编对读者的阅读具有相当大的助益。1996年，英国学者彭马田(Martin Palmer)的全译本《庄子之书》(The Book of Chuang Tzu)由伦敦企鹅图书公司(Penguin Books Ltd.)出版。1997年，美国诗人、翻译家戴维·亨顿(David Hinton)等人合译的选译本《庄子内篇》(Chuang Tzu: The Inner Chapters)由位出版社(Counterpoint)出版。1998年，美国诗人山姆·哈密尔(Sam Hamill)与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中文系教授西顿(J. P. Seaton)的译本《庄子精要》(The Essential: Chuang Tzu)由波士顿巴拉出版社(Sambhalla Publications)出版。1999年，中国学者汪榕培与任秀桦合译的《庄子：汉英对照卷》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本土译者贡献的首个《庄子》译本，后入选“大中华文库”，该译本只在中国国内发行了。

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学者妮娜·科里亚(Nina Correa)于2006年在其互联网网站“开放论道”上发表了《庄子》首个电子全译本《庄子——无界》(Zhuangzi - “Being Boundless”)。2008年，美国华裔学者胡聪(Chung Wu)翻译并注释的《道家学说中的庄子智慧》(The Wisdom of Zhuang Zi on Daoism)由彼得朗国际学术出版集团(Peter Lang Inc.,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ublishers)出版。次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中国古典哲学的教授任博克(Brook A. Ziporyn)再次对《庄子》进行了全本翻译，译著名为《庄子：传统注释选集之精华》(Zhuangzi: The Essential Writings with Selections from Traditional Commentaries)，由哈克特出版公司(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出版。至此，《庄子》的英译工作暂告一段落。